

# 作为媒介的社会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 建构的影响

——基于苏州市M村的个案研究

杨风云 马中红

**摘要:**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革,传统的乡土团结逐渐瓦解。同时,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的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社区空心化和人际关系淡化,进而加剧了乡村的原子化趋势。在此背景下,重建乡土团结成为乡村治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研究以苏州市的一个乡村为案例,以媒介交转性为理论视角,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作为外源型力量的社工组织进入乡村后如何成为媒介,并建构人与人、人与村庄的新型关系,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再团结。之所以选择社工组织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社工组织作为一种公益、半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在社区营造、便民服务供给、社会关系调解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乡村社会的团结建构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发达地区的村庄而言,其公共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备,通过集体修路、铺桥、造公厕等“事件团结”的方式凝聚人心、培养互助友爱精神,已变得收效甚微。而社工组织这种通过社会支持来培养群众公共性和主体性的外源型力量,恰好能弥补此类村庄团结机制缺失的问题。研究发现: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首先通过便民服务供给的方式,将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以此密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次,在连接的基础上,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经由交往实践,建构了一种彼此交融的整体化生活方式,展现出社工组织的媒介“交互”作用;再者,借由交互实践,社工组织与村庄之间共同编织出一张新的社交网络,使得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庄的社会关系格局;最终,在社工组织促成的关系再生产后,村民的公共性和主体性得到强化,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体现出强烈的互助友爱精神,建构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总体来看,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塑造,经历了一个“建立连接—展开互动—再生关系—建构意义”的递进式动态过程,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为乡村治理的媒介化转向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社会组织;媒介;交转性;乡村生活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3-004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319);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3214)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民是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他们既是乡村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亦是乡村建设的推动者。

在政策号召、市场需求和人才回流的综合作用下,行政权力、市场力量、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乡村的介入愈发显著,乡村振兴的主体来源得到丰富,而要想发挥多元主体乡村建设的合力,保障基层群众的合法权益,重点在于构建强劲的乡村共同体,使之成为村民主体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活动的重要载体,令其在与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中激发主体意识,成为乡村建设的在地力量。除此之外,共同体作为村庄的存在形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承纽带,蕴含着国人的想象和期许,是孕育乡愁文化的温床,一旦分崩离析,乡土文化将不复存在,由此带来文化传统丧失、社会凝聚力削弱、国家形象受损、民族认同感丧失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建构乡村共同体的意义在于为基层治理、农业发展等提供支持,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

如今,乡村共同体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鸡犬相闻”的“乡土中国”,在科层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冲击下,内生于传统乡村,由宗族、伦理、文化等因素建构和维系的乡村共同体逐渐式微,乡村再也不是村民之间知根知底、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日渐松散,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村庄公共性日趋消弭”<sup>[1]</sup>,原子化、空心化、村社理性的消解等问题都造成了村民对村庄归属感的弱化。而乡村共同体衰落造成的原子化趋向已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约乡村振兴高效推进的隐患。然而,笔者在苏州进行田野考察的一个乡村,其共同体色彩却在社工组织的介入下愈发凸显,日常生活中串门唠嗑,村民间的互助精神,以及对于村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十分显著。

不同于城市社工组织单纯承担生活服务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功能,驻点在乡村的社工组织还扮演着沟通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的媒介角色。乡村社工组织无形中成为集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文化生活服务、民意反馈、社会教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换言之,社工组织这个平台汇聚了乡村社会中诸多的传播内容,它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性重塑,以及人际交往、乡土文化、传播方式的转译和表述,将中国乡村社会独特的生活图景和运行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所蕴含的传播内涵因内嵌于村庄日常生活场景,且与地方化的集体记忆相勾连,因而显得独树一帜。社工组织的在地化实践过程中,由于将乡村社会中的多元主体相连接,进而成为德布雷意义上的“媒介装置”,它的出现,将支离破碎的乡村社会关系又重新聚合起来,建构出有别于传统熟人社会的新图景。基于此,可以发现社工组织对乡村共同体的建构遵循了一种媒介化的内在逻辑。由此,我们不禁会问,社工组织介入乡村后对乡村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换言之,社工组织是如何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传播生态中发挥其媒介作用,并使人与人、人与乡村之间产生关系的?

## 二、文献回顾

### (一) 乡村共同体的内涵界定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有关人员基于本质意志(情感、习惯、记忆等)结合而成的社会联结形式<sup>[2]</sup>。在他看来,村庄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其成员相邻而居且形成了密切交往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sup>[3]</sup>二战后,日本学者围绕中国乡村是否存在共同体展开过激烈论争。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的肯定论者坚信中国乡村是紧密团结的村落共同体,强调公会等乡村内生组织使人们结成彼此依存的生活集合,而公共性质的农事活动作为载体,则培养着村民之间的亲近感和义务感,维系着社会互助。<sup>[4]</sup>以戒能通孝为代表的否定论者认为,中国乡村是由分散的个人组成,共同体性质并不凸显。在该流派看来,内生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互助的情感连带性较弱,以事件或活动为纽带而形成的团结协作,本质上还是局限于村民之间以利益为导向的理性打算<sup>[5]</sup>,村民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和情感联结并不突出。

福武直认为,中国乡村既非村落共同体,也非个人集合体,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生活共同体。<sup>[6]</sup>

国内研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生活共同体的内涵。张思从乡村共同体成员的行动目的出发,指出村民间的合作行为既有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又有遵循互助友好的共同体道德规范<sup>[7]</sup>,在他们的理性交换中混杂着亲密的情感要素与合理的交换要素<sup>[8]</sup>。另有研究者从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出发,认为乡村生活共同体是由社会组织、公共规则和共同体精神组成,而社会组织是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组织载体,以满足农民共同需求为导向<sup>[9]</sup>;公共规则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制度要素,作为地方性规范,指引行动者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sup>[10]</sup>;共同体精神是生活共同体的内在价值要素,表现为共同的价值理念、成员之间的互助意识与信任、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sup>[11]</sup>。

结合先行研究关于乡村共同体的解读及笔者田野考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进一步聚焦,将乡村共同体的探讨落点在乡村生活共同体上,并作出如下理解:从性质来看,乡村生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生活互助单位,成员之间既有情感层面的友好互助,也有基于个体私欲的理性打算。从指向来看,建构生活共同体旨在改善乡村内部团结机制的涣散问题,重塑公共性,即“一种组织起来之后的合作精神和主体性自觉”<sup>[12]</sup>。构建乡村生活共同体意义非凡,具体而言:一是能够打破乡村的原子化现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互助意识;二是打破村民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割裂局面,密切干群联系,提升村民的公共参与度;三是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地方归属感。

## (二)媒介交转性:理解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传播学视角

目前,学界对于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研究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历时性变化。这类研究主要片面地探讨了国家行政权力和市场力量介入下,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式微问题,但却忽视了两者的正面意义。二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路径。这类研究集中在刻画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应然状态,对于如何重建乡村生活共同体缺乏深入研究,为数不多的几篇相关文献是从社会学视角,以内生于乡村内部的民间组织作为考察对象,鲜有对外来社会组织的考察。因此,以外来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可以考察其在介入乡村的过程中,是如何重新构建乡村社会关系,并强化群众的参与性和组织性,进而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和可能。值得一提的是,以乡村内生性组织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规制对村民组织性和参与性的强化,关注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以地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组织规则、制度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区别于此,本研究更强调外来力量在嵌入乡村过程中对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主体性的激发,重点从人的交往与社会关系层面探讨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简言之,文章从媒介的视角出发,以外来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剖析乡村生活共同体在当代重建的一种新可能,即将外来社会组织视作媒介,探讨其如何发挥媒介作用而促成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那么,如何理解媒介的作用?米歇尔和汉森认为,媒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媒介性”,而这种“媒介性”就是“调节”(mediation),即“调节”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sup>[13]</sup>,也可以被认为是媒介的功能与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mediation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具有多样化的翻译,比如“调解”“中介化”“中介”或“调节”。在“调解”的意涵里,更强调一种调停、(暂时)和解或达成共识,作用在互为“对手”的两端,而媒介所指的mediation却并非纠缠在“对手”或对立之间,而是更广泛对象间“间接的衔接”<sup>[14]</sup>。“中介(化)”往往与“媒介化”形影相随,强调“新传媒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运用”<sup>[15]</sup>和“媒介科技发展所涉及的社会脉络”<sup>[16]</sup>的问题,也有学者将“中介化”的视野引向社会思想史中人的交往问题。相较于“中介”这一比较抽象或具有混淆性的表述,“交转性”<sup>[17]</sup>或许更能显示出“媒介性”的所指。正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言,媒介的重点在于它是“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sup>[18]</sup>,没有媒介就无法形成两者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交转”的意义在于媒介可促使不同因素交织,并“着实”地起到连接两端、形成关系甚至相互转化的作用,从而生产出新的整体、开拓现实。

“交”即(使)交叉、交汇、交织,“转”即流转、转化、转译。建立在“交转性”的基础上,不仅仅是作为技术—设备系统的大众媒介,实体空间、社会组织等同样都可被视作媒介。

既然媒介的作用或特性是在于它的交转性,我们不禁要问,媒介是如何使连接对象之间进行关系转化,从而展现其媒介性的?笔者认为,在解析媒介性的运作机制之前,有必要对媒介介入某一情境的缘由追根溯源,如此才能洞悉媒介与现实社会的勾连逻辑和背后动因。立足于媒介交转性的视角,梳理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技术媒介论者的媒介传递观和仪式观,还是空间媒介论者的城市“可沟通性”,又或是机制媒介论者对媒介化治理手段的讨论,他们对于媒介性的剖析都离不开“连接”“互动”“关系”“意义”这几个关键词。因此,文章对媒介的“交转”机制归纳总结为建立连接、展开互动、再生关系、建构意义四个面向。首先,“建立连接”指的是通过媒介作用而形成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连接,包括人与物、人与各种信息经验、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其次,正是建立在连接的基础上,媒介实现了“展开互动”的功能,互动即是交流、交往,以媒介为依托的各类元素相互碰撞、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媒介也与其他元素进行着互动。再者,“再生关系”主要指在媒介的介入下,其连接对象之间因交往状态的改变所引发的关系再生产。最后,“建构意义”是指在媒介的作用下,最终成就了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非凡意义;同时,媒介本身也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基于此,笔者发现媒介交转性与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有着共通性,二者都试图触发不同元素间的关联,进而生成新的关系状态,我们可以将媒介理解为乡村生活共同体这一关系状态建构的载体,结合本研究,这里的媒介即是入驻乡村的社工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组织是指以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等为宗旨,由民间力量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或半盈利性质的组织,具有自主性、非政府性和公益性等特征。而社工组织则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类别,其特点在于专注于提供社会工作服务,例如社会援助、社区发展、心理咨询等。因此,社工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特殊形式,在乡村场域的社会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综上所述,文章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是如何内嵌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勾连人与人、人与乡村社会的。或者说,媒介交转性在多大程度上建构了乡村生活共同体这一互助单位。

### 三、研究方法 with 案例介绍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 M 村是隶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的行政村,该村位于吴江区西南约 28 公里处,距最近的集市 5 公里。全村占地面积为 6.3 平方公里,现有 16 个自然村,31 个村民小组,共计 958 户,3226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为 1020 人,约占总人口的 31.6%,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M 村现有耕地面积 1335 亩,人均耕地 0.86 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等作物,但这些耕地已被村集体通过流转的方式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其中部分耕地则被外来的种植商户所租赁,村民手中只有少数菜地可供自营。吴江区纺织业发达,乡镇企业众多,其中不乏世界五百强和中国一百强企业,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目前,M 村有一半左右的青壮年还留在村里,其余的基本都住在平望镇或邻近的震泽镇和盛泽镇,还有部分住在吴江城区。留在村里的青壮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只不过工作地点是在镇上,不在村里;而那些搬离村庄的青壮年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会回村与父母住几天,处于一种“离土不离乡”的状态。M 村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空心村”,但由于年轻人的工作、社交和娱乐基本都在城镇,老年人实际上成为村庄日常生产生活的主体。

N 社工组织全称“苏州市吴江区 N 社工服务社”,是依托于吴江区某电子信息公司成立的一家专门提供社会支持服务的社工机构。该机构于 2021 年 4 月中标承担平望镇人民政府委托的总价为 30 万元的“2021—2022 平望镇‘美好家园’试点项目”,要求在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协助镇政府完成

M村乡风文明建设,并总结出可在全镇推广的服务模式。N社工组织入驻M村开展社会工作分为六个部分:一是前期摸底和工作规划。N社工组织在中标后,随即派遣专职社工入驻M村,在大体了解村庄实际情况后,随即根据镇政府要求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二是入册建档。2021年6月,N社工组织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全村215户村民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个人诉求、人际交往、邻居关系、地方认同、公共参与等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结果以入册建档的方式被纳入中长期工作规划中。三是定期汇报与深化合作。N社工组织在项目开展的全过程中始终秉持“勤汇报,多合作”的理念,坚持每月向镇政府汇报工作情况,并与村委会开展全面合作,以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四是特定人群服务。采用个案、成长型小组、支持型小组、个别督导等专业化方式为贫困户、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支持。五是开展公益服务。N社工组织在村内广泛招募村民志愿者积极参与公益服务,内容形式有星级文明户评选、抗疫支援、便民生活服务、孤寡老人送温暖、传统节日做手工、年终文艺汇演等。六是村级组织培育。围绕文化遗产与志愿服务两个方面招募村民志愿者,成立了庙会分乐善卫士、邻里一家亲、乡村讲解员等多支社区志愿者团队。“庙会分乐善卫士”队伍旨在引导村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目前团队共有9名成员,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团队成员每周定期巡查2次,并向广大村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邻里一家亲”志愿队伍成立的初衷是密切村民之间的联系,培养社区互助精神。现有成员40余名,主要工作是围绕村庄残疾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展精神慰藉、生活资助、入户陪伴、文体活动等四类帮扶。“乡村讲解员”队伍目的是将M村的美好风土人情推荐给更多外来游客,提升游客参观质量。团队成员共10人,主要承担外来参观者的路线讲解和接待任务。

笔者于2022年9月19日至2022年12月24日连续在M村围绕N社工组织及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开展田野调查。调查方式主要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其中参与式观察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线下观察时笔者不但以志愿者身份全程参与10场公益活动,还以“新乡人”身份在该村生活了三个月,以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线上观察对象包括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村民朋友圈和抖音动态。与此同时,笔者还深度访谈了村民志愿者、普通村民(非志愿者)和社工组织的驻村专职人员,总计31位,其年龄分布在28~76岁不等,文化程度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本科,退休前或现职业有村干部、工人、教师、退伍军人、服务员、医务人员、工厂老板等,每位访谈对象访谈时间均不少于60分钟,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一览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退休前或现职业	身份
1	张YT	女	28	本科	N社工组织驻村负责人	社工组织专职人员
2	周L	女	33	本科	N社工组织驻村工作人员	社工组织专职人员
3	张YY	女	29	本科	N社工组织驻村工作人员	社工组织专职人员
4	李XM	女	64	高中	小学老师	村民志愿者
5	杨AG	女	55	初中	妇女主任兼村委副主任	村民志愿者
6	赵GZ	女	64	初中	纺织厂员工	村民志愿者
7	徐GF	女	58	初中	仓库管理员	村民志愿者
8	周NX	男	57	小学	保安	村民志愿者
9	顾XN	女	63	小学	餐厅员工	村民志愿者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退休前或现职业	身份
10	杨 CY	女	57	高中	护士	村民志愿者
11	徐 PX	男	66	初中	军人	村民志愿者
12	赵 FY	女	59	小学	农民	村民志愿者
13	庄 AP	女	64	小学	农民	村民志愿者
14	吴 YE	女	68	小学	餐馆老板	村民志愿者
15	杨 AM	男	66	小学	原村书记兼村主任	村民志愿者
16	赵 RW	男	53	初中	出租车司机	村民志愿者
17	潘 SL	女	61	不识字	农民	村民志愿者
18	吴 XY	女	74	小学	纺织厂员工	村民志愿者
19	陈 W	男	44	本科	村卫生院医生	村民志愿者
20	周 AF	女	55	初中	理发师	村民志愿者
21	沈 JQ	男	60	高中	现村书记兼村主任	村干部
22	吕 CY	女	53	小学	农民	普通村民
23	徐 JN	男	62	高中	纺织厂老板	普通村民
24	胡 YD	男	66	初中	木匠	普通村民
25	杨 AM	女	75	初中	水果店老板	普通村民
26	陈 H	男	40	高中	丝绸店老板	普通村民
27	周 JY	女	63	小学	清洁工	普通村民
28	吴 XQ	女	76	小学	纺织厂员工	普通村民
29	徐 YY	女	62	小学	农民	普通村民
30	程 CH	女	68	小学	纺织厂员工	普通村民
31	杨 RG	男	74	初中	电工	普通村民

#### 四、应时而生：社工组织介入乡村场景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关系在现代性冲击下发生巨大变化,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使群众被迫去集体化,再加上媒介技术的下沉,使得乡村在地化整合机制能效退散。基于此,学界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一些学者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观察到“事件团结”或许是再造乡村生活共同体的一大突破点,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共同修路铺桥、架设路灯、修建公厕等都有助于促进村民之间的彼此联结,培养互助、团结的共同体精神。<sup>[19]</sup>但苏州的乡村经济水平普遍发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对于M村而言,以公共事件为纽带构建生活共同体的可行性较低。需要指出的是,M村严重缺乏集体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和休闲娱乐空间,老年人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饭后散步、村口小卖铺门前零星点点的唠嗑外,几乎没有其他社交娱乐活动,家家户户围墙高垒,互动较少。集体性的公共事物和文化活动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M村构建生活共同体内生力量的形成。然而,是否所有在乡村内部自发形成的能够促进村民交往,增强群体认同和情感联结的活动实践都能成为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内生力量呢?

在 N 社工组织入驻 M 村之前, M 村的村民自发形成了两类独具乡土特色的交往实践。一类是群体性的烧香拜佛活动。M 村分布着大大小小 6 座寺庙, 七成以上的老年村民会在农历每月十五结伴去烧香拜佛, 在寺庙这个阈限空间里, 村民聚集在一起虔诚祷告, 互相聊着生活中积德行善的壮举, 也会相互倾诉生活中的不如意, 以求获得对方给予的精神抚慰。这种基于烧香和交往活动而构建的信仰集群归根结底成就的是精神和情绪的共振, 成员间是一种情感联结, 其载体——烧香拜佛——因虚无缥缈, 脱离日常的生产生活实际, 且没有公共规则的约束而极为松散, 无法营造互助友爱的生活共同体氛围。在田野考察中笔者发现, 这些由烧香拜佛结缘的“香友”间虽也有日常往来, 但目的大多为聊天解闷, 并不会深入交往, 更谈不上生活上的互助合作, 正如村民吴 XQ 所言:“大家因为烧香凑一起, 跟真正的朋友或者关系好的邻居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 没办法真正交心。朋友、邻居之间在生活上还能互相帮帮忙, 这些一起烧香的, 不会真正关心你的, 跟你交往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功德, 找找心理安慰, 真正要请他帮忙做个事, 不是这里有事, 就是那里不方便。”

另一类是自发形成的打零工实践。M 村绝大多数老年村民即使已过退休年龄, 甚至已有八十多岁, 仍然会与同村村民一起在村里或镇上打临工, 并不是因为缺钱, 而是“闲在家中无事可做”(杨 RG, 普通村民)的无聊、“我家要比你家赚钱更多”(程 CH, 普通村民)的攀比心理、“游手好闲会被邻居说闲话”(程 CH, 普通村民)的舆论绑架等多重因素的合力, 裹挟着他们试图通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充实、能干和家庭的富足美满。这些村民因打临工而聚集, 因打发无聊、逃避舆论、富足家庭的共同期望而建构起群体认同。而这种群体形式充其量只是基于纯粹的个人目的而生成的地域社群, 一旦没有招工就无法形成, 内生性弱, 持续性低, 且流动性强。“平常一起打工的虽然都是村里的, 但是大部分都不怎么熟悉, 今天来打工了, 明天可能就不来了, 大家关系也就一般, 凑在一起主要就是打发打发时间。别看我们去打工的时候都是同进同出, 看着很团结, 但是真正喊着让一起去给村里头做点事, 各个都成了缩头乌龟。疫情的时候, 村委会在村里的微信群召集村民帮忙去搬镇政府发的口罩、手套、消毒液这些东西, 村干部都喊破喉咙了, 就是没什么人出来做义务劳动。后来书记让我去喊那些跟我一起打工的村民来帮忙, 结果最后就喊到两个人。”(杨 RG, 普通村民)可见, 这两类集群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精神慰藉和一己之欲而短暂形成的社群, 没有公共规范的约束, 以利己为导向, 不利于培养互助、友爱、团结的共同体精神, 更无法激活村民的主体意识。因此, 烧香拜佛和打零工所生成的交往实践, 并不符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生活共同体意涵中治理型乡村、幸福型乡村、发展型乡村的意义导向, 更无法成为推进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内生性动力。

在 N 社工组织介入前, M 村与国内大多数村庄一样, 除了上述的人情冷漠、缺少社交外, 自然村之间敌对感明显, 村民团结意识薄弱, 地方归属感不强。据 M 村现村书记兼村主任沈 JQ 说:“在 N 社工组织来村里之前, 我们村委会每个月都会接到不下 40 起的村民投诉, 大多是抢占菜地、家里花被偷、邻居造房子噪音大之类的邻里纠纷, 本身大家关系又不是很好, 就算是挨着住的平常都不怎么说话, 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会儿, 左邻右里之间经常串门, 可热闹了。除了这些投诉, 我们这些村干部还要花不少精力处理公物损坏的问题, 不是今天在这修垃圾桶, 就是明天在那儿修埋在地下的路灯电线。村里风气总的来说不太好。”当地政府充分意识到乡村原子化带来的基层治理问题, 也综合考虑到 M 村缺乏内生性的村民自组织基因这一现状, 所以萌生出借助外来力量来重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想法, 希望通过社工组织介入的方式, 以开展志愿服务为载体, 培养互助奉献的社区氛围, 提高村庄凝聚力。

## 五、从原子化到去原子化: 社工组织在乡村的交转性实践

交转性视阈下的媒介之所以能发挥连接作用, 转化两者的关系, 原因在于它占据了特定关系链

条中的某一位置或功能,但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据不同情境和关系得以确定<sup>[20]</sup>,这说明媒介本身已成为某一系统或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着交转作用。社工组织作为服务供给平台与乡村多元主体之间存在无可厚非的交互实践。在实践中,社工组织以服务供给为路径成为地方文化建构和社会关系生产的媒介,形塑着村庄的日常交往和传播生态。将社工组织视作媒介,即揭示了社工组织所具有的媒介性。

### (一) 建立连接:媒介勾连对象的聚合

乡村社会的原子化趋势肢解了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冷漠加剧了人际交往的断裂,村民以地缘为纽带构成的群体凝聚性变得松弛,群体认同感降低引发的各种矛盾和游离感,淡化了村民的地方归属感,致使其日常生活实践基本围绕自我和家庭而展开,较少参与到村庄公共生活中,沦为村庄发展过程中的局外人,由此加剧了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土崩瓦解。在此情况下,N 社工组织在 M 村的出现给公众提供了一种“聚合的机会……如没有聚合的机会,则只有各自在家发愁叹气。能够常常聚合,就可以渐到自觉里去,渐往大家齐心合作解决问题”<sup>[21]</sup>。在社工组织的聚合下,村民之间的交往发生了由私域朝公域的转向,使公共感得到重塑,而社工组织也借此嵌入地方关系网络中,成为社交建构平台,日益影响着村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指出的是,社工组织作为连接的媒介,主要勾连了两类对象,即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

社工组织之所以能超越公共服务供给而具备社交功能,得益于“物”的可供性和驻村社工人员的主体性行动。一方面“得让村民们知道 M 村有社工服务这么个事以及日常服务在哪儿开展”(周 L, N 社工组织专职人员)的及性逻辑,使服务与服务供给场所成为客观化的存在。M 社工组织虽借用了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作为驻点,却并未在外设置指示性的招牌,但当测血压、理发、磨刀、编竹篮、广场舞教学、农夫市集、手工 diy 等便民服务在 M 村的日间照料中心、村委会广场、村委会会议室及其他场所开展时,村民便能确认“M 村有专门为村民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了”(赵 GZ, 村民志愿者)。这种对于空间场所功能意义的认知,即是吉布森意义上“物”的可供性。可供性并非单纯为物所作用的对象所拥有,而是在该对象与其他元素组合时生成。<sup>[22]</sup> 在本研究的语境中,即可理解为在便民服务与服务供给场所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村民前来享受服务的想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完服务即走的快餐式体验不同,大部分村民享受完服务后并不会立刻离开,尤其是像农夫市集这样的服务活动,村民会长时间驻足停留,跟往来于此的村民和摊主唠嗑打趣。由此可见,村民的社交实践是以便民服务的可供性为基础而展开。村民志愿者徐 GF 说:“其实有些服务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必需的,在家自己就能满足,主要就是想找人说说话,凑凑热闹。去村里其他地方转不一定有人,但有便民服务的地方肯定有好多人,太热闹了。”

另一方面,为满足村民需求,使村民与 N 社工组织保持粘性,三位专职驻村社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类型。N 社工组织专职人员张 YT 说:“之前几位村民问我们过年过节能不能组织大家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温暖,还有些村民表示想重拾以前跟大家一起劳作互助的温馨回忆,我觉得这两个诉求都很好,索性就做了结合,策划了一个 diy 送温暖的服务,组织村民志愿者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做重阳糕、过年包饺子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每当临近节假日就会有許多村民志愿者前来村委会会议室 diy 节日食品送给孤寡老人,这些志愿者因共同的善心而结缘,因志愿者活动而相聚,他们在共同的 diy 中回忆以往的睦邻友好生活,在送温暖中强化自己的互助与奉献精神。除此之外,为了给村民创造更多相遇相知的机会,N 社工组织还特地从吴江区请来专业人士教授村民广场舞,以丰富村庄的文化娱乐生活。为此,N 社工组织还在村委会大院的广场上安装了照明灯和音响。每天傍晚,广场上都会有村民过来学习舞蹈,随着广场舞队伍的壮大,N 社工组织还为村民专门成立了“M 村舞蹈队”,带着他们参加村级和镇级的文艺汇演。有意思的是,广场舞活动不仅吸引了喜爱跳舞的村民,那些不跳舞的村民也会在每天傍晚音乐响起之后陆续来到广场上凑热闹。“每晚在村委大院的广场

上跳广场舞”(徐 YY, 普通村民)成了一种生活惯习,傍晚的广场舞时间被赋予一种“广场人满时分”<sup>[23]</sup>的媒介意涵。广场舞实践由此成为村民强化连接,消解无聊、孤独,构建群体认同的有效举措。“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又是一个集体了,待在家里各干各的像什么样,聚在一起才叫村子嘛,不然跟城里那种谁都不认识谁的生活有啥区别。”(赵 FY, 村民志愿者)在乡村环境中,村民间的集体行为,如共同参与活动、分享价值观念会促使他们产生群体认同,并激发其作为村庄一员的身份意识,带来对村庄集体存在的感知,从而强化归属感,在心理和情感上实现村民对村庄的连接。

与此同时,志愿者微信群的建立亦成为聚合村民,实现连接的重要渠道。“M 村志愿者队”是 N 社工组织创建的一个微信群,成员包含村民、社工组织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建立之初是为了用于服务通知和日常交流。久而久之,该微信群不仅成为村民开展线上社交的平台,还成为村民与村干部即时沟通和民主参与的重要渠道。在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下,微信为 N 社工组织整合各类资源的同时,也为村民、村干部、社工组织工作人员打造了一个突破时空限制的互动场景。简言之,微信群作为缺场交往空间,形塑了一种“虚拟在场”的日常生活场景,实现了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的“共同在场”,其中村民与村干部的连接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村民与村庄连接的面向之一。村干部作为基层政府在乡村的代理人以及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渠道,通常担任村庄治理者的角色,负责协调村内事务、资源分配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村干部成为村庄的一种具化体现,而微信群的聚合功能则实现了村民与村庄的连接。

需要指出的是,N 社工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勾连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的媒介,离不开人与环境的互动。村民的社交意愿会促使 N 社工组织的服务内容和供给方式产生变化,从而形成新的互动,并在反复实践中成为生活方式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被锚定下来。当其以社交的方式被类型化后,村民的日常实践和观念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N 社工组织媒介交转性生成的前提是其作为社交平台的连接性,通过人的聚合而满足村民的交往需求。

## (二) 展开互动:媒介勾连对象的相互激发

媒介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控制参与到身体、感官及认知的形塑<sup>[24]</sup>是媒介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倘若媒介不只局限于设备或技术,当社工组织作为媒介之时,它的媒介性是如何产生作用的?社工组织通过使被连接对象之间“展开互动”的形式,彼此激发交互实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乡村居民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开始了一种以城市契约精神为特征的生产生活实践,内生于乡土社会的习惯法逐渐式微,“人情”“面子”“道德”等传统熟人社会约定俗成的公共规范失去约束力,村民像一盘散沙,过着以利己为导向的个体化生活。随之而来的各种纠纷、矛盾扰乱了乡村秩序,使基层治理雪上加霜。昔日农忙时节邻里间互帮互助的劳作景象更是难得一见,乡村社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团结成为空中楼阁。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契机,农文旅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建设、提升乡风文明等各种举措在 M 村铺陈开来,以开展社会工作为主旨的社工组织就是提升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作为内嵌于村庄的便民服务平台,社工组织“联结了物质空间中参与实践的各种物和人,并将人们的意向反映在空间实践中”<sup>[25]</sup>,催生一种本地化的乡村社会关系和实践形式。“所有事物的‘象征性’都起着联结作用,用来联结一个个体同另一个个体,一个可视的事实和一个隐形的‘事实’<sup>[18]</sup>”。就 M 村而言,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建立连接后所触发的交互实践主要发生在村民与村民,以及村民与村委会之间。

第一,社工组织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交往,使之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呈现。乡村社会的传播活动是乡村文化的折射,能够直观反映人们的生活理念、行动逻辑、风俗习惯等,是乡村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真实写照。<sup>[26]</sup>N 社工组织在连接村民的过程中,使村民的传播实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介,影响着

个人与群体生活。一方面,社工组织为村民提供了个人展演的平台。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发现,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村民会赋予自身的行为实践一种教化功能,然后以大众传播的方式触动周边村民。杨 AG 是志愿者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作为 M 村的前妇女主任兼村委会副主任,几乎每次志愿服务都能看到她的身影,久而久之,她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成为村里的先进事迹,屡受村民好评,她也由此收获了“M 村大好人”的名声。杨 AG 每次参与活动和受表彰的照片都会出现在她的微信朋友圈和抖音里,并给村民带来一定的触动。村民志愿者周 NX 作为杨 AG 的邻居,在受访时坦言:“她实在太乐于助人了,每次看到她做志愿者为村里做好事,而我作为她的邻居但一次志愿者没做过,都会被村民说闲话。后来我就索性跟着她一起做起了志愿服务,做了志愿者后才明白,为村里做贡献也是在为自己谋福利。在我之后,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也加入了进来。”虽然杨 AG 做志愿者存在自我展演的成分,但不论目的如何,村民在看到她穿上志愿者服装的那一刻,首先已经在内心对她给予了认可,作为“在土新乡贤”<sup>[19]</sup>,她的行为和事迹得到极大传播,并被赋予教化功能而感染其他人。因此, N 社工组织搭建的展演平台借由德治实践所传达的互助、奉献精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村民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另一方面,围绕志愿者活动和服务生成的舆论实践也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公共规范。“中国农村的农民都是喜欢面对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庄共同的交往中获取生活乐趣,提高生活质量及了解村庄信息的”<sup>[27]</sup>。“闲聊”是中国村民交换信息、“参事议事”最常见的形式,在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谈论志愿者活动和服务的过程中,夹杂着道德评判的话语在熟人网络中以人际传播的形式扩散,在村庄内部逐渐形成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公共规范或价值,对于行动主体的日常行为能够产生约束性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大众传播形式的志愿者微信群,则为村庄多元主体营造了一个基于新媒介的公共讨论空间,密切了村民间的交往实践。笔者统计了田野考察期间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大致可分为日常闲聊、商品交易、通知公告、集体讨论这四类,其中以日常闲聊和集体讨论这两类占比最大,涉及节日问候、信息分享、公共事务讨论等内容,见表 2。微信群的快捷低成本和个性化的交流方式,增强了村民的交往意愿,再加上村民志愿者这类积极分子的带动,更是密切了村民之间的线上交往,提高了情感联结,减弱了具身离散状态下村庄的原子化倾向。

表 2 M 村志愿者微信群聊天内容整理

类型	主题	聊天内容总结
日常闲聊	节日问候	过年过节发祝福语,互发红包。
	信息分享	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和视频;健康养生知识;国家政策;国际局势变化;气象播报;教育指导,如中考、高考名家讲堂;各种福利信息,如医疗保险、网购优惠。
商品交易	购物拼单	拼多多、淘宝购物凑单;物资团购,如疫情期间 N95 口罩、退烧药、牛奶、鸡蛋、猪肉的集体团购。
	销售推广	村里商店产品或业务上新通知:如“××超市刚到一批新鲜蔬菜水果”“××日杂店即日起售卖烟酒”“××日杂店即日起提供快递服务”;产品推广:如“××装潢店定制窗帘”“××文印店打印 2 毛钱一张,复印 1 毛钱一张”;购物优惠:如“镇上××农资店搞活动,肥料、种子买一送一”。
	购物咨询	“哪里有草鸡蛋卖,要 100 个”“谁家有不用的二手电动车,急需购买”“镇上菜场哪里能买到新鲜的河虾”。

续表

类型	主题	聊天内容总结
通知公告	免费福利	特殊群体送福利:如“退伍军人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带残疾证到日间照料中心来进行免费康复训练”“贫困家庭每月享受最低保障 1533 元”;正常群体福利享受:如“免费送家庭财产保险一份”“美丽乡村建设,村委会免费为各家进行庭院修缮”。
	工作动员	便民服务:如“本周日下午 2 点,日间照料中心的便民服务活动需要志愿者 6 名,可获得 6 个积分”;星级文明户评选:如“后天下午 2 点,开展星级文明户入户评选,需志愿者 12 名,可获得 12 个积分,并获酬劳 50 元”;特殊群体送温暖:如“本周六上午 9 点,开展孤寡老人送棉被活动,需要志愿者 5 名,可获得 4 个积分”。
	服务供给	讲座学习:如“明天下午 1 点半,M 村老村部二楼会议室有义诊活动加讲座,请大家相互转告”;文艺演出:如“明天上午 9 点半,在村委会广场有一场大型表演活动,欢迎大家前来参与观看”;便民服务:本周六上午 9 点,在日间照料中心有义诊、磨刀、理发、手相等服务,欢迎大家来参加”;技能培训:如“下周三晚 7 点,村委会广场有广场舞培训,吴江区的专业老师来授课,欢迎大家参加”。
	政策下达	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通知;儿童接种疫苗通知;大专进修本科通知;参军入伍通知;土地流转通知;宅基地管理;疫情防控通知,如“即日起每隔两天在村委会进行全民核酸检验”“疫情期间红白喜事需上报备案”。
	安全防控	夏季防溺水通知,如“近期溺水事件频发,各位家长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气候变化通知,如“未来一周风雪天气,大家减少外出,做好防范”。
集体讨论	乡村发展	政治层面:如“M 村最近来访的高官不少,希望市里的政策多多关照我们村”;经济层面:如“要是能把村里的旅游业发展起来就好了,大家卖卖农产品,收入肯定能再往上去”;文化层面:如“平望的酱文化这么有名,镇政府怎么就不好好宣传包装一下呢”;社会层面:如“现在的生活真没意思,大伙联系也不多了,只顾在家玩手机,看电视”。
	公共事务	维护公共财物:如“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破坏村口的垃圾桶,这是公共财物,损坏要赔偿”;民主选举:“这次××不知道会不会当选,我反正不看好他”;民主监督:“现在村里搞了个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这下好了,我们也能当家做主了,哈哈”;环境卫生:“现在村里的卫生好多了,环境好了之后出门散步心情都舒畅了,大家继续努力”;安全保障:如“天气热了,大家请定期检查家里的煤气罐”。
	矛盾纠纷	偷窃:如“真的太没素质了,花刚栽两天就被挖了,真气啊”;吵架:如“××家真是养了个不肖子,连老子都打,白养了”。

第二,社工组织对于村民与村委会而言,发挥着现代乡村治理模式接口的作用,在治理实践中实现了村民与村委会的交互。M 村的现任村书记和副书记都不是该村选举产生,而是由镇党委选派,受制于乡土社会的排外心理,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断层较为严重,村民不但鲜与村干部交流,而且很少主动到村委会公示栏查看通知。N 社工组织到来后,村民的日常公共活动很多都是围绕便民服务的供给场所展开,其辐射圈在村庄内部建构了一个传播场域,加深了村民与村委会的互动。由于 diy 活动和广场舞都在村委大院的地盘,频繁出入村委大院的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村书记在大院里听取民意演变为常态化的场景。同时,志愿者微信群也成为村干部与村民讨论日常事务的重要渠道,借由在线交流的快捷性与虚拟性,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身份上的“官民”不对等被暂时性

削弱。“进了这个群后,我反倒是积极了不少,遇到对咱村发展不好的事,我都会在里面说上两嘴,群里聊天没有太多拘束,反而很自由。”(周 AF,村民志愿者)这种基于微信群构建的公共交流空间,实现了村民与村干部的共时性沟通。久而久之,村民对村委会的疏离感逐渐消逝,由原来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转变为如今的主动关心,而且还会积极参与到决策中。由此,村民与村庄于媒介意义上建立了新的互动形式,两者间的脱嵌状态逐渐被打破。德布雷认为,媒介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能够将传承的物质载体组织起来的制度<sup>[28]</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将各种物质和关系载体连接在一起,在适应村庄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勾连起一种村民与基层自治组织经由交互实践展开的村庄治理活动,使村民与村庄的相互作用得以加深。

### (三)再生关系:媒介勾连对象间状态的调整

社工组织作为内嵌于村庄社会的便民服务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生成了一种“情境布局”,<sup>[29]</sup>借由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进行关系再生产。随着社工组织在地化趋势不断加深,其“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越来越成为人在生产、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一个中介物”<sup>[30]</sup>,在其编织的交互网络中,将连接的多元主体赋予新的内涵和功效,使连接对象之间的状态不断重塑,进而实现关系的再生产。在此关系场域中,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社交活动越来越频繁,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不断增强。

一方面,在 N 社工组织的推动下,志愿者活动、广场舞、微信群成为村民之间构建人际交往的纽带,促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实现了社交关系再造。在这里,社交关系被重构的村民主要有两组类别。一是邻里之间。村民陈 H 说:“原先我们家与隔壁徐 GF 家之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搞得好久不来往,但后来在志愿活动中发现徐 GF 还挺有奉献精神的,为人也比较热心,再加上她经常跟志愿者队伍一起来给我们送服务,慢慢地两家关系又好了起来。”除此之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冲击下,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变得更专注于自我的家庭生活、工作或个人兴趣爱好,而弱化了与邻里的交往意愿。但社工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将左邻右舍从各自的私人空间拉到了公共空间,不论是线下亲历开展的志愿活动或广场舞,还是线上虚拟共在的微信群,都密切了邻里间的交往关系。二是半熟人之间。在城镇化与科层制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度逐渐下降,再加上村民之间缺乏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历,由此形成了半熟人的社会关系状态,即除邻里外,与其他村民之间更多表现为一种“只知其名,不解其人”的特征。而社工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活实践,则为原先的半熟人之间提供了相遇和相知的机会。村民志愿者赵 RW 说:“做志愿者时间长了,发现大家在一起挺说得来的,而且我们同为志愿者,说明都是有奉献精神的,在这一点上就很投缘。虽然之前不怎么熟悉,但也不影响我们的相处。熟悉之后我们会经常相互串门。”也有村民表示,“以往相互碰见,碍于面子,会象征性地打声招呼、闲聊几句,因为平常见面机会少,没什么聊天的冲动。反倒是志愿活动让这个村子热闹了一些,我们虽不做志愿者,但是喜欢来凑热闹呀,这样大家就又熟络了起来。我们还通过微信群互加了微信,没事就会微信上聊。”(吕 CY,普通村民)在社工组织的作用下,村民间关系的再生产至少可总结为三点,即由冲突走向和解、由冷漠走向热忱、由陌生走向熟络,而其交往实践也由被动的、随机的社交,转变为发自内心的、主动寻求联系的情感社交。

另一方面,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使得其在基层治理中与村庄的关系完成了由局外人向参与者的转变。不论是微信群中村民与村干部关于村庄事务的讨论,还是村委大院中书记听取村民的反馈,都能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促使他们参与村庄的日常治理,进而增强村民的地方感,将其与村庄联系得更加紧密。举例来说,每逢年底村委会都会联合 N 社工组织在村里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对获选家庭进行表彰。评选活动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环节,初选是以生产组为单位,先由每个组内部筛选出 10~15 户家庭上报给村委会,再由 N 社工组织的村民志愿者去参选者家中实地走访拍照。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志愿者会以“监督者”的角色自我要求,以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乡村治理做出贡献。“当我穿上这身志愿者服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监督者,我必须认真负责起来,因为这是个大事,我们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一定要比其他村还要好。”(陈 W,村民志愿者)大

部分村民会积极配合评选活动,将庭院内外的环境卫生工作做得细致入微。“以前觉得村子发展跟我们平民百姓关系不大,但是经常在志愿者群里跟大家讨论村里的事,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什么,这不正好搞这个评选嘛,我把卫生搞搞好,也算是为村子做贡献了,村子好看了才能给领导和游客留下好印象。”(胡 YD,普通村民)村民志愿者和普通村民通过“星级文明户”的评选,身体力行地参与村庄治理,由此密切了与村庄的联系,并通过附加荣誉的方式强化了村民对地方的归属感,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地缘依赖为核心的地方依恋。

库尔德利在探讨媒介化时,重点关注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由此提出媒介化研究的建构论主张,即“媒介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社会生活,在媒介里流通的意义如何产生社会影响”<sup>[31]</sup>。按照库尔德利“社会建构”论的逻辑,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无疑成为建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村庄日常生活,通过自身的媒介化实践对村民的生活方式进行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引发地方感与文化的重构,在提升乡村日常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完成了以社工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再造。

#### (四)建构意义: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在特殊的连接、互动与关系再生之后,社工组织超越了服务供给平台本身的固有属性,呈现出其建构乡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媒介意涵,即社工组织的媒介交转性创造了新的乡村生活共同体景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促进村民的社会交往和价值追求。建构生活共同体是一项涉及村民生活方式、组织创建和村庄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工程,村民参与是关键。M村55~80岁的普通村民是生活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基本都发生在村庄内部。事实证明,在社工组织的媒介作用下,不仅能够推动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还有助于培育互助精神,“充分调动起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积极性,通过农民再组织化过程形成集体合力,促成共同体精神复归”<sup>[9]</sup>。一方面,组织化的志愿服务<sup>①</sup>能够满足仪式参与者的社会交往需求。便民服务供给、志愿者微信群、广场舞活动是村民参与社会互动的开放性场域,以及提供意见交流和讨论的场景,他们可以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村庄事务或个人问题进行交流,表达意见、分享经验,借此扩大社交圈,密切联系,促成身份认同与群体认同的构建,将村民之间离散化的社会关系重新聚合起来。另一方面,志愿服务深度契合中老年村民对守望相助这一本体性价值的精神追求。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sup>[32]</sup>。村民志愿者顾 XN 表示:“退休在家太不自在了,游手好闲真不是个事,去做做志愿者至少心里图个安慰,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在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粽子、月饼的时候,我也会想象自己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给我送温暖的样子。我现在帮助别人,以后别人肯定也会帮助我,大家都是互帮互助的。”首先,老年人退休后失去了实现自身劳动价值的机会,老一辈勤劳吃苦的秉性反而使得他们担心自己赋闲是没有价值地活着,而参加志愿服务则将他们的劳动价值转化为服务对象所需的使用价值,保证了其闲暇生活的充实和有意义。其次,老年人会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以情境假设的方式预想自身被帮助的场景。志愿者服务能够帮助村民实现自我对乡村互助情景的合理想象,他们坚信只要自己平常积极为他人服务,将来也会得到相应的回馈。当村民参加志愿服务的次数越多,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

第二,提高组织协同度和群众参与热情。志愿服务将社工组织和村委会各自的优势有效整合,并将涣散的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了乡村社会的有机团结。社工组织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通过劳动分工机制让成员之间建立稳定持续的合作关系,而成员间的意见领袖功效会感染到更多村民,在村庄内部形成互助氛围。社工组织有着村委会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作为内嵌于村庄内部的公益服务平台,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再加上其去政治化、去商业化的特性,能够便捷有效地对接村民。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执行者,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它借助社工组织将村民组织起来,开展乡

<sup>①</sup>志愿服务即是 N 社工组织动员村民志愿者为村庄免费提供的便民生活服务和其他服务。

风文明建设,可以降低村组两级直接负责乡村建设的行动成本。村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双重叠加效应,协同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村民自愿摆脱个人意识,在组织引导和制度规范的约束下以志愿者身份,主动参与村庄的公共服务活动或事务中,营造出责任共担、互助友爱的团结氛围。与此同时,村民从个体化的私人空间逐渐走向公共活动领域,使得他们的社交范围得到拓展,社会参与方式也多元化起来,频繁密切的互动有助于拉近相互间的心理距离,强化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sup>[33]</sup>。

## 六、结论与讨论

重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实质是打破村庄内部基于个体私欲建立起的一个个抱团取暖的流动性社群,重塑村民的公共生活领域,从整体上形成扎根本土的生活互助单位,进而提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章先是阐述了社工组织进入乡村的缘由,勾勒出村庄原本的原子化社会状态;而后从媒介交转性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社工组织介入乡村后,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即从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庄的连接,到连接对象的相互激发,再到关系的再生产,最终在村民参与性和组织性强化中再造乡土团结。区别于媒介研究的社会效果论和制度化取径,文章侧重于从社会建构的范式出发,以关系为视角来探讨媒介的可能性,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的(非结构的)、文化的、审美的(非政经的)、空间的(和时间并置的)、日常生活的(非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非理性的”<sup>[34]</sup>传播意义。立足于该视角,研究发现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历经了一个“建立连接—展开互动—再生关系—建构意义”的递进式过程。

首先,社工组织以便民服务供给为载体,将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体聚合起来,在主体间的社交实践中社工组织的“连接”性愈发明显,从而密切了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其次,在“连接”的基础上,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实践又建构出一种融合相生的整体化生活方式,展现出社工组织作为媒介的“交互”作用。再者,作为一种连接性媒介,社工组织在与村庄的交互实践中开始编织出一张新的关系网络,使村民、村委会等网络节点日渐被整合起来,赋予新的内涵和功能,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庄的社会关系格局。最后,在社工组织促成关系的再生产之后,村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组织协同性大幅提升,他们在村委会与社工组织的领导和动员下,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领域,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共塑团结互助与亲密友爱,推动了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就本研究而言,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将村委会、普通村民、参与志愿服务的乡村精英等连接起来,在一个动态勾连的交互网络中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关系格局,建构起以生活互助为基础,以公共参与为导向的乡村生活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的启发是,关于乡村原子化带来的整合机制涣散问题的探讨,可以突破社会学的政策制度、经济社会解构、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范式,从社会交往角度着手,以媒介为方法论,以乡村的日常生活为焦点,探索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建构途径。除此之外,对于媒介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物本身,而应置于社会结构这一宏观语境中,探讨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文章所探讨的社工组织即是这样一个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媒介,它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交往方式,重塑了乡村居民日常交往中的公共性,为乡村治理的媒介化转向提供了可能。

### 参考文献:

- [1] 杨华. 陌生的熟人:理解 21 世纪乡土中国.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3.
- [2]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林荣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3-44.
- [3] 李荣山. 共同体的命运——从赫尔德到当代的变局. 社会学研究,2015,6:215-241+246.
- [4] 李国庆.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 社会学研究,2005,6:194-213+245-246.
- [5] 蔡磊. 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研究. 学术界,2016,7:168-175+327.
- [6] 周选和,焦长权. 中国农村研究的日本视野:“共同体”理论的东渐、论战与再认. 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1:

- 159-189.
- [7] 张思.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8.
- [8] 张思.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 中国农史,2003,3:85-96.
- [9] 马平瑞,李祖佩. 乡村振兴与村庄生活共同体构建——基于湖北省 H 村的个案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65-173.
- [10] 王德福. 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65-66.
- [11] 杜怡梅.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精神共同体与社区的关系. 理论与改革,2013,5:146-148.
- [12] 沙垚. 新媒体与乡村:从科技兴农、媒介赋权到公共性重建.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89-95.
- [13] W·J·T. 米歇尔,马克·B·N. 汉森. 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 肖腊梅,胡晓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2.
- [14]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03.
- [15]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3-162.
- [16] 唐士哲. 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 新闻学研究,2014,10:1-39.
- [17] 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 探索与争鸣,2022,1:142-148+180.
- [18]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 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22;29.
- [19] 方旭东. “事件团结”:新媒体与新乡贤共同体——基于三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2017,11:82-96+326.
- [20] 郭恩强. 在“中介化”与“媒介化”之间:社会思想史视阈下的交往方式变革.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8:67-72.
- [21]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1.
- [22] 马修·福勒. 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 麦颠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6.
- [23] 克琳娜·库蕾. 古希腊的交流. 邓丽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
- [24] 施畅. 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7:33-53+126-127.
- [25] 李耘耕. 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一种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 国际新闻界,2019,11:6-23.
- [26] 邱新有,章绍甫. 论中国乡村人际说服传播的三重情境——对雁门和杨村个案的再思考.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57-60.
- [27] 贺雪峰. 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 中国乡村研究,2008,1:139-152.
- [28] 郑素侠,李雪丽. 作为媒介的乡村超市:聚合、联结与关系再生产——基于一个中部乡村的田野考察.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2,3:171-185.
- [29] 关琮严. 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4:57-72+127.
- [30] 赵瑞华. 媒介化生存与人的异化. 新闻记者,2010,2:29-32.
- [31]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
- [32] 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 开放时代,2008,3:51-58.
- [33] 董磊明. 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51-57.
- [34] 孙玮. 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 新闻大学,2012,2:41-47.

##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Mediu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f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Based on M Village in Suzhou

Yang Fengyun, Ma Zhonghong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industry,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lifestyles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and the traditional local unity has gradually collaps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un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rur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a village in Suzhou as a case, takes medium transfer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dopts online and offlin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s to explore how a social organization become medium after entering the village and construct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the village, so as to promote the re-unity of rural society. The reason why this paper chooses a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at as a kind of public welfare and semi-public welfare social organization, i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ervice suppl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eople, and social relations medi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nity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for some villages in developed areas,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of these villages is quite complete. "Event unity" such as building roads,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public toilets together to unite people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has become less effective.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as an exogenous force that cultivates the public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masses through social support, can exactly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unity mechanism in such village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s a media, a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first connect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villagers and village cadre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convenient services, so as to clos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within the village.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on, the villagers and village cadres, through communication practice, construct a lifestyle that integrates with each other, demonstrating the "interaction" role of this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interactive practice,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and villages jointly weave a new interactive network, which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 and villagers and villagers and village cadres, thereby reshaping the village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afte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promoted by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the public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villagers are strengthened, and the strong spirit of mutual help and friendship is reflected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 public affairs. The beautiful picture of the rural living community is constructed. Overall,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ving community by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as a medium has gone through a progressive dynamic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connection-developing interaction-regenerate relationship-constructing mean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constructed by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reshape the publicity in the daily life of villagers and provide a possibility for the medium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medium; transposivity; rural living community

---

■收稿日期:2023-07-24

■作者单位:杨风云,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马中红(通讯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